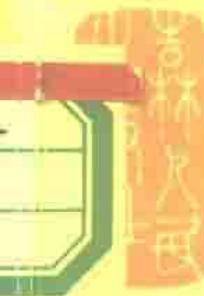


宋养琰 魏化纯 张佐友 著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

宋养瑛 魏化纯 张佐友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编 者 说 明

本书第二、九章由北京出版社魏化纯同志执笔，第三、十章由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张佐友同志执笔，其余各章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宋养琰同志执笔。全书最后又由宋养琰同志修改完稿。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

宋养琰 魏化纯 张佐友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271,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11册

统一书号：4091·352 定价：2.0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1)
第二节 生产关系的“三分法”和 “四分法”	(12)
第三节 生产关系的共性和特性.....	(24)
第四节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34)
第二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42)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 义革命的两种设想.....	(42)
第二节 过渡时期及其两种形式.....	(47)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模式.....	(65)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 生产力	(75)
第一节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 的根本任务.....	(75)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和系统.....	(84)
第三节 增加社会生产力总量的途径.....	(90)
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03)

第一节	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商品经 济命运的争论	(103)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存 在的原因	(111)
第三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23)
第五章	社会主义调节是有计划的市场调节	(135)
第一节	什么是市场调节	(135)
第二节	有计划的市场调节	(152)
第三节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优势	(162)
第四节	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173)
第六章	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	
	和形式	(189)
第一节	按劳分配思想的由来和发展	(190)
第二节	按劳分配“量”的规定性	(197)
第三节	按劳分配在当代的实践	(207)
第四节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资	(219)
第五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规律 和工资政策	(230)
第七章	社会主义消费关系	(244)
第一节	社会主义消费关系质的规定性	(245)
第二节	社会主义消费关系量的规定性	(251)
第三节	社会主义消费结构	(264)
第四节	社会主义消费在社会主义再 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76)
第五节	社会主义国家要对居民生活 消费进行科学指导	(285)
第八章	经济规律体系和计划经济	(296)

第一节	经济规律.....	(296)
第二节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人们的 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30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体系.....	(311)
第四节	计划经济是经济规律体系运 行的特定形式.....	(320)
第九章	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益和目的	(333)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效益.....	(333)
第二节	坚持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 益的统一.....	(337)
第三节	搞好经济决策和提高经济效益.....	(345)
第四节	提高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主 义生产目的.....	(352)
第十章	社会主义社会是开放的社会	(356)
第一节	开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 然趋势.....	(356)
第二节	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一项基 本国策.....	(36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论是社会 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一 个重要理论基础.....	(368)
第四节	积极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和关系...	(377)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往往被人误解为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科学，这是不对的。

政治经济学一词是由经济学一词演变而来的。经济学最早源出于希腊文oikoumia。意思是家庭经济管理。后来的拉丁文的oeconomia，就是由上述希腊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西方语言中的经济学一词，如英语中的economy，法语中的economie，都源出于拉丁文oeconomia，因而归根到底来自希拉文的oikoumia。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学一词的是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人色诺芬，他所著的《oikoumikos》一书，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经济学。最早也曾有人译成“家政学”。内容主要是分析和记载奴隶主如何管理自己家庭内部的财产和奴隶的事。到了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经济开始全面地向商品经济过渡，经济问题逐步超越了家庭的范围。于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首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他之所以在经济学上加“政治”一词，无非是想以此说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

题已经超越了家庭管理的范围，而扩大到对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管理。可见，这里的“政治”同现在我们通常讲的“政治”，其含义是不同的。1755年，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代表人物卢梭，写了一篇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使“政治经济学”这个俗语又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不过他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理性学说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与过去的含义又有所不同。此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英、法等国，广泛地流行开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相继著书立说宣传了它。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出版，震动一时，其中就大力宣传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出一辙，都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把重点放在如何增进社会财富的生产和财富如何分配以及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上。与此相关，他们所能阐明的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看不到物与物关系的背后所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不如说是历史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为此，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批判和继承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也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称为“理论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使用过“理论经济学”这个名词。现在也还有人主张使用“理论经济学”这个名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对原先政治经济学在涵义上简单地复述，而是增添了许多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包含原来的经济管理之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经济管理的客观依据——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把生产关系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所完成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所以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的。当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已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不能相容。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能如实地去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以及必然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性，以此来武装无产阶级。厚厚的三本《资本论》，其宗旨也就在这里。

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①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都先后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不论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如何发展变化，但不能忘本，不能忘掉它原先就具有的管理经济职能的涵义。忘掉这一点，不仅是理论上的缺陷，对实践也有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样演变而来的。

到了十九世纪末，在欧洲，有人提出用“经济学”一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理由是：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是个复合名词，使用不便，而且 economy 既有经济又有经济学之意。从而主张在 economy 加上 “ics”，既可省去“政治”二字，又可以表示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意思来，并可与 physics (物理学)、mathematics (数学) 取得相类似的字尾，使人一看便知是一门科学。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此后，economics 在西方流行起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就通用了。

历史在前进，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今天我们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把研究的对象仍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为研究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生产关系上，而是要按照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对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要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而且要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即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研究的不是生产力的自然属性，而是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即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和配置，研究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应当明确，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科学的人来确定的。任何人在确定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时，一方面要取决于主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客观的实际。不管是主观的需要还是客观的实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对象”也要随着发展变化。想用一个僵化了的定义，（不管这个定义在当时看来如何圆满）来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

目前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论争，争论的双方均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困扰。因为他们都想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所下的定义不仅是完美无缺

的，而且是永恒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对象”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讲求实效，讲求它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发展过程，讲求它对实际是否有用，讲求它能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对于当代经济科学的研究，如果不是用静止的观点，而是用发展的观点；不局限于国内，而放眼世界，不难看出，经济科学在近代特别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早已冲破了原先那种具有传统格调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框，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就目前的状况而论，经济科学形成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门类相当繁多、用途极为广泛的庞大的“科学群”。

面对这个“科学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即质的对应性和量的比例性，或者我们通常讲的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它们之间原本存在着的“远亲”、“近邻”关系，进行必要的排列和组合，从中尽可能地理出一个合乎规律的层次来，以利于我们今后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参考。

现在看来，从总体观察，在经济科学这个“科学群”中，大体可以分为三大层次。

一是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这个概念，最早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了批判杜林提出来的，后来人们很少提到它。现在看来，这个概念并非陈旧，对现实还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原理，着重从总体上或全局上去把握经济生活中某些事物的性质、特征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理论经济学是理论基础。属于这类科学在当代已经有：政治经济学（当然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从广

义上讲，还应包括研究经济现象演变过程的经济史，研究经济学本身发展过程的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等。

二是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是相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讲的经济学科。它侧重于对现实经济在应用方面的研究，讲求实用和实效。由于近代和现代科学越来越向应用方向发展，所以应用经济学一般说来要比理论经济学发展得更快一些，更丰富一些，更生动一些。应用经济学包括的学科比理论经济学更为广泛。大凡构成国民经济各个局部运动的一些经济过程和经济问题，都在它的研究之列。根据现状，已经可以看出，在它研究范围之内的，大体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部门经济学。它是研究国民经济各个具体部门的经济运动过程，其中包括有：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贸易）经济学、邮电经济学等。

第二类是专门经济学。它是研究国民经济一些专门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其中包括有：计划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金融学、劳动经济学、人力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物资经济学、投资学、市场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

第三类是综合经济学。它是研究在国民经济总体运动中的一些综合性因素和问题。其中包括有：国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

三是技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侧重于对与经济有关的技术性和方法性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有：统计学、会计学、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技术经济管理学等。技术经济管理学又可分为国民经济技术管理学、部门经济技术管理学、地区经济技术管理学、企业经济技术管理学等。从方法论上看，

它还包括从自然科学中移植过来的并与经济相结合的带有一些方法论的学科，诸如经济控制论、经济系统论、经济信息论等。

上述三个层次的先后相承和彼此结合，正是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科学领域中所形成的一个初具规模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表明，经济科学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兴旺发达的新时代。可以预料，经济科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它必将随着社会经济实践进一步去丰富和发展自己。

必须指出，我们这本书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去研究经济科学中所有的经济学科，而是去研究在经济科学中作为理论经济学原本形态而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在有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是，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的大量涌现，原先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大的存在必要了，可以从经济科学体系中把它取消了。这是一种很有害的错误认识。为了澄清并纠正这种认识，很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楚，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究竟能在经济科学系统中以及在经济科学当前和今后发展的种种倾向中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和起到怎样的作用？

首先，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打破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历史上形成的彼此封闭状态，过去那种隔行如隔山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而先后相继出现了许多由于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交叉作用而混合生成的边缘学科。据西方经济学者统计，属于这类经济学科迄今大约有一百多种。虽然它们与传统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已经相去甚远，但从“血缘”关系上看，仍属于传

统政治经济学的“嫡系”。因此，今天我们来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不能因为经济科学的发展，而全盘否定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无是处。要知道，传统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历史上已经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而且也是当代经济科学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达到如此繁花似锦地步的基础。在当代经济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中仍到处渗透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即作为基本原理而存在的并对它们仍起指导作用的一些普遍真理。“昨天未必包含今天，但今天常常孕育在昨天之中”。忘掉了这点，就等于忘掉了传家的“法宝”，同时也意味着忘本。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讲，也不能甚至无论如何也不该固守在祖宗遗留下来的那点“家业”上，无视各种科学已经发展起来的活生生的现实。今天，政治经济学所以仍有存在的必要，甚至越来越显得重要，就因为它自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事实上，它每天都在广泛地从近代或现代各种科学中，去吸取自身所需要的营养。现代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理论经济学，它应当成为一切经济科学基础理论的缩影，也就是一切经济科学的集锦，是属于更高层次的科学，是“智慧之神”。因而，它的存在，对于一切经济科学在理论上都具有指导意义。看不到这一点，更难以认清它的身份、价值、作用和意义，难以估量它在继往开来时代中所担当的重任。

其次，现代经济科学在自然科学影响下，越来越向应用、技术和效益的方向发展。但必须看到，任何科学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当代科学的发展，的确越来越多地讲究应用和效益，讲究对人类是否有用和有用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是不成的。比方，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当然首先要有先进的各种

科学技术，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足以指导这个城市按照合理布局、经济实惠、美观大方并有广阔发展前途进行建设的思想。理论经济学对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的指导作用，必然会越来越显得重要。从发展上看，随着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必然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管理效率，相应地引起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来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的科学理论，即理论经济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例如近些年来，由于石油、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能源日趋减少甚至濒于枯竭，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积极地从事核能利用的研究，以期用丰富的核能资源来代替石油和煤炭。可是，随着核能利用的增加，核电站的兴建，又产生了严重的对人们经济生活的核污染。如何来解决核利用和核污染的矛盾，这就不仅是自然科学来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来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再次，现代经济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也越来越向定量的方向发展。据哈佛大学多伊奇在七十年代发表的题为《有利于社会科学重大进展的条件》研究报告中说，从二十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取得的62项重大成就中，有70%是属于定量分析的问题。基于这种原因，有些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就武断地认为，对于经济问题如果不进行定量分析，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在他们看来，一切经济模式都是数学模式，都是用数学公式或图表来表达的经济理论。意思是说，数字是至高无上的科学，除数学外，其它的一切理论都不能称其为理论，不能成为科学，因而都可以废弃。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模式不等于数学模式，数学模式只

不过是经济模式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数学模式只能表明数量关系，而经济模式旨在表明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中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规律，以及人们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规范和准则。在这里，谁也不否认，在适当的场合，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式来说明一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量的规定性的必要。但必须认识到，量总是一定质的量，对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分析，都不能忽视其质的规定。先定性，后定量，或既定性，又定量，这大概是对任何事物在理论分析上的常规。如果无视这些要求，一味地“唯数量而数量”，“唯公式而公式”，其结果定会导致在许多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或做出荒谬的判断。西方有的学者曾在事实面前感叹地说：“电子计算机，输入的是废料，输出的也是废料。”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到底不等于数学，它的根本任务，只能放在对事物及其发展进行定性分析上，而不能放在定量分析上。定量分析只是在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产生必要时，才是有意义的。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单靠数学方法是解决不了的。比方，我们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用什么量来表达它的涵义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用高度的思维能力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才能阐述清楚。

总的来说，今天，固然用理论经济学来排斥和否定应用、技术经济学，否定定量分析，是要不得的；而用应用、技术经济学，用定量分析来排斥、否定理论经济学，否定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不对的。

在我国，经济学一词使用较晚。据考证，三国以后，有人写文章说：“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说的是，西汉的司马迁、司马相如最会写文章，诸葛亮最会搞经

济。这大概是在我国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地方。但这里说的“经济”，主要指的是诸葛亮的那种“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的经世济民之才，而与今天我们讲的经济不完全相同。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早在十月革命前也略有所见，但这只闪烁在少数人之间。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就介绍了马克思（当时译成麦喀士）的思想，其中包括经济思想。1903年《译书汇编》发表文章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并附有马克思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广泛地传播还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系统地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1920年，新青年社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到了三十年代，才有人把《资本论》全文翻译过来。过去，我们对于政治经济学和对待其它科学一样，照抄照搬，成了进口的“政治经济学”。就当时的情况看，在所难免。现在看来，这样做不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他要同实际相结合；不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知道，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不相同了。列宁不止一次地引用哥德在《浮士德》中的一句台词来告诫人们：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意思是说，生活要比理论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复杂得多，而且生活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理论要经常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要坚持，第二要发展，任何一种片面地强调某一方